

21世纪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推荐课程系列教材

中国文化导论

◆ 主编 陈荣杰

(第二版)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惊喜，
在转眼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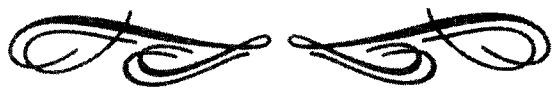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清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中国文化导论

ZHONGGUO WENHUA DAOLUN



(第二版)

主 编 陈荣杰

副主编 任家瑜

编 者 陈荣杰 任家瑜 邵林涛 吴思增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内 容 简 介

本书根据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需要,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深入浅出地概述了儒、道、墨、法、兵诸家以及佛教、道教的内容,再由作为民族性格、民族心理之根底的观念文化,拓展到器物文化。在保持传统文化原生状态的同时又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由史而论,以论述史。第二版充实或修正了中国文化基本命题的表述,诸如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道家的“道”、法家的“法”,重写了引论、饮食与服饰、传统艺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类教材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导论 / 陈荣杰主编.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1 (2011.3 重印)
ISBN 978-7-04-031772-5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文化—中国—高等学校
—教材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6507号

策划编辑 熊雪芳

责任编辑 熊雪芳

封面设计 吴 昊

责任印制 蔡敏燕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21-5671728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010-58581118

邮政编码 100120

免费咨询 400-810-0598

传 真 021-5696534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http://www.hepsh.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7年4月第1版

印 张 15.25

2011年1月第2版

字 数 300 000

印 次 2011年3月第2次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1772-00

序

陈荣杰教授请我为《中国文化导论》作序,深为荣幸。该书的出版及课程的成功使我惊喜地发现,这正是我多年心有余而力不能及的期望。

大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传统意义上,大学以传播知识、创造知识、储存知识为天职,承担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其核心目标是为社会输送具有人文精神及科学精神的高层次人才。

由于激烈的升学和就业竞争,今日的大学生面对着甚多的名利诱惑及生存发展的压力。他们颇为匮乏必不可少的人文知识,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及背景知识。而这必将会对大学生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公共必修课“中国文化导论”犹如雪中送炭,为丰富、充实大学生的人文知识,进而实现人文精神的建树和提升,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为通过调整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进而调节学生的能力结构提供了重要契机。

没有知识的传授,就谈不上精神的传授,有了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不一定就表明拥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知识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老化和更新,然而其所蕴涵着的先哲们的伟大精神和深邃智慧,诸如独特的观察视角、分析途径、解决方法,传承于今日仍然光彩照人,仍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实践。所有知识上升到最高境界都是哲学,所有从不同观点出发获得的投影之高度综合才是事物真实的形象。兼容并蓄、由表及里、去粗取精,掌握知识中所负载的精神内容,这是大学生们在阅读此书时可取的学习态度,祝愿各位大学生通过该教材的学习,实现在精神上与先哲们的对话,从而成为懂“物理”、辨“事理”、明“人理”的青年才俊。后成“家”,先成“人”。

祝《中国文化导论》走向更大的成功,祝大学生们学富五车而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人。

钱旭红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
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2005 年 2 月 2 日

目 录

引论 黄土地·中国人——文化中国	1
第一章 礼义之教——儒家文化	16
第一节 儒家概述	17
第二节 孔子	23
第三节 孟子、荀子及《大学》《中庸》	28
第四节 儒学与中国文化	33
第二章 逍遥之道——道家文化	43
第一节 道家概述	43
第二节 老子	46
第三节 庄子	49
第四节 道家与中国文化	53
第三章 兼爱之说——墨家文化	65
第一节 墨子及学派	65
第二节 墨家与中国文化	69
第四章 富国强兵之术——法家及兵家文化	74
第一节 法家概述	74
第二节 法家与中国文化	80
第三节 《孙子兵法》和兵家文化	87
第五章 涅槃之境——佛教文化	92
第一节 佛教发展历程	93
第二节 佛教的教义教规	102
第三节 佛教与中国文化	106
第六章 神仙之道——道教文化	114
第一节 道教概述	115

第二节	道教的神仙世界	120
第三节	道教与中国文化	127
第七章	约之以礼——礼仪与民俗	135
第一节	岁时节日	135
第二节	人生仪礼	141
第三节	交往礼仪	148
第八章	华夏营造——建筑文化	154
第一节	古代建筑概述	154
第二节	皇家建筑	160
第三节	宗教建筑	163
第四节	园林建筑	168
第五节	民居建筑	171
第九章	器以载道——器物文化	175
第一节	玉器文化	175
第二节	青铜文化	181
第三节	陶瓷文化	185
第十章	足食丰衣——饮食与服饰	192
第一节	饮食文化	193
第二节	服饰文化	205
第十一章	传意传神——传统艺术	212
第一节	书画艺术	212
第二节	音乐舞蹈艺术	219
第三节	戏曲艺术	225
参考文献		232
后 记		234

引论

黄土地·中国人

——文化中国

郑和从1405年至1433年七次率领船队远航,到达过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明朝的航海技术、舰队规模乃至国家的综合实力都称雄世界。诚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言,郑和舰队的实力不但远远超过了亚洲各国的水师,甚至超过了欧洲各国海军的总和。^①郑和所率领的由两万七千多人、两百多艘船组成的海上机动编队,并没有强取豪夺、掠人抢物,更没有攻城陷堡,建立要塞。朱棣赋予了郑和“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以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郑和在西方社会有很高的评价,又使许多人难以理解。郑和之后,哥伦布率百余人三艘船到达了美洲,达伽马率百余人四艘船到了好望角。新大陆的发现给欧洲带来了丰富的宝藏,美洲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而给新大陆带去的则是掠夺、战争和流行病,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从那以后减少了90%。郑和为什么没有像欧洲航海家那样发展海上贸易?当然这不仅仅是郑和个人的作为。明朝皇帝制定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立国方略,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这样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传令。”而郑和以及明朝统治者的行为和思想又是由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行为模式(亦即文化)所决定的。

今天,中国的崛起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热点”,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从我们的现实环境,从我们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开始,为了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应该审视、总结我们的文化传统,在继承和发展中逐步创造新的文化。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向世界,这就促使了我们文化自觉,越来越迫切地要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中国、关注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这也使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现实和传统产生兴趣,从而有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就学于“孔子学院”。

^① [英]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5. 479—484

一、文化与中国

我们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是在中国的文化中成长,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

1. 何谓文化

英语中“文化”包含这么几层意思,①“高雅文化”,其意义与“艺术”、“文明”相近;②个人修养,比如说“有文化修养的人”;③文化产品,诸如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④一个既定人群的“全部生活方式”——一个特定群体的观念、价值、信仰的模式以及他们“典型”的思考和感知方式。①“文化”,在中国古代是“文治教化”,与“武功”对举,也就是礼乐和典章制度等等,如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②但当今被大家使用的“文化”一语却转译自日本,对应于拉丁文的“cultura”,基本义是对农作物的培植,后被引申为对人类心灵、情操、知识的培养。

英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将它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③泰勒的这个概念,一百多年以来由各个学科、各个学派引申,所谓“既定人群的全部生活方式”,也就是社会实践所累积并借助符号而传承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再比如美国学者克罗伯·克拉克洪的论述:“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显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及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其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④

人的存在、人的行为乃至全部生命活动由文化引导、约束。动物凭借自然本能行为,因而世界各地狮子捕食、繁衍的生命方式没有大的区别。人的饮食、居住和生命延续为文化所规定;既定的人群有其特定的观念、价值、信仰以及思考和感知方式,因而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其生活方式千差万别。比如饮食,有的人吃面包,有的人吃米饭,等等。再从日常生活来分析,人们必须以生活世界为背景进行其生命活动,只有当个体对周围世界拥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感受,拥有所谓秩序感、心理安全感,他才可能与他人进行社会互动。生活世界包含着由特定群体所认可并共享的期望、观念和知识。比如饮食,宴会厅和食堂有不同的程序。

文化,“既定人群的全部生活方式”、“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

① 戴维·英格利斯. 文化与日常生活. 武桂杰,苑洁,张秋月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9

② 卢元骏注释. 说苑今注今译.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八年. 517

③ 泰勒. 原始文化. 连树声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1

④ 傅铿. 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2

惯”、“外显或内显的行为模式”，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总体，一个完整的系统，表现为文字等符号，表现为人们的习惯、习俗，等等。目前学术界将文化大致区分为三个层面，换言之，人类的“文化”现象可以从三个层面予以把握。

最表层的是物态层面的文化，或称“器物文化”，指物质形态所表现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包括人类加工创制的各种器具。例如衣裳、冕帽、鞋、袜，再如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宫殿、平房、楼房、窑洞、帐篷，等等。文化中最直观的便是这种物态文化。提及中国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长城、故宫、苏州园林以及瓷器、茶、旗袍等。

处在这一层面之上的是制度和行为层面的文化，指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规范人们行为、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包括制度、法律、礼仪、习俗和机构组织，等等。比如中国人的端午节、清明节。

最抽象、根本性的是意识层面的文化，亦即观念、价值、信仰以及思维方式，它表现于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等。

精神文化、观念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器物文化、制度和行为文化日积月累，必然沉淀、升华为观念文化，而精神领域的欲望、追求也自然会在行为和物质产品中现实地展开。比如清政府的外交官郭嵩涛向巴西国王起立致敬，听音乐会时频频翻开节目单。他的副手乃至朝廷要员认为他有辱国格，因为他们的观念里外国乃藩属之邦、化外之地，所以应该表现出庄重，并予以藐视。

2. 文化于中国

中国文化，指的是在华夏大地上生存、发展的群体——中华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即我们民族的观念、价值、信仰的模式以及“典型”的思考和感知方式。我们是中国人，筷子、茶、瓷器、团圆饭、同乡会、孔孟、老庄、佛禅等等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的文化支配着我们每个人的情感、思维和行为举措。比如对人民和祖国的爱、责任感，在我们文化中最强烈而又最朴素的表述是“做人民的儿子”，焦裕禄风雪夜看望孤寡老人就说“我是您的儿子”。而另一种文化的人则不能理解，甚至以为焦裕禄是图谋老人的家产。

中国，指的是土地、人民，更是共同生活的历史以及积淀起的文化传统。正是共同的价值观使华夏大地上的人民逐步融合，形成一个共同体，于是就有了中国、中华民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五百年前后称为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以及犹太教的先知，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几个地方的古代文化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就是在轴心时代，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几千年来繁衍发展，生生不息。两河文明、埃及文明比中国成熟得早，规模也大得多，但它们均没有延续，成为文化的化石。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

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①从秦到汉,中央集权国家的构建凭借的是儒家以及法家的思想观念;魏晋之间,天下大乱、暗无天日,人们从庄子的学说中找到了精神的家园;唐宋时期,佛教兴盛,儒学衰微,人们又重新回到孔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运动;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的呼声日趋高涨,这时法家和墨学被重新重视。总之,我们的先祖不断地从我们的“轴心时代”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我们讲中国的文化,也就应该将重心放在“轴心时代”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以及后来的佛教文化上。因为它们构成了我们民族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的核心,也是我们民族应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维新图强的思想宝库。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他从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料,实行农战为本、编户齐民、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等等。汉武帝独尊儒学,以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秦汉的政治制度以及运转方式一直被后人所承袭,统治阶级以严刑峻法、集权专制驾驭民众,又标榜“以孝治天下”,以儒家所弘扬的伦理道德统一人心。是谓“外儒内法”,“明倡儒经、暗行法术”。汉末释教东传、魏晋玄学盛行,士大夫和庶民通过佛老之说找到了一个可以逃避现实苦难的“境界”、“田园”,是谓“儒与道、释互补”。这构成了中国文化性格的另一个纬度:儒道互补。一者是积极入世,引导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追求世俗性的满足;一者则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理想境界。在士大夫是佛老思想,在百姓则更偏向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再进一步说,与“外儒内法”、“儒道互补”的上层文化相对应的,还有以墨家重义尚气为核心的下层文化,清官、侠客的传说便集中反映了民众对义气的崇尚和追求。

3. 中国文化于当代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加,世界几乎成为一个“村庄”。这固然要求我们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更要求我们掌握和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我们毕竟是作为“中国人”参与“地球村”的合作与竞争的,我们可以穿西服、讲英语,但是,我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方式不可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和传统。也正是作为中国人,可以而且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成为具有“中国心”、“中华魂”的一代新人,承担起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传统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内核,支撑着华夏儿女顽强、坚定地迎接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种种挑战,生生不息,继往开来。

中国文化是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我们讲中国文化也就要追溯历史,探究传统。不过,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弄清楚过去的事情,并不是要探究究竟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关注的是过去的事情所累积起来并持续下来的东西。我们走进历史是为了触摸传统,摸清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延续的“生活方

^① 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魏楚雄,俞新天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4

式”——从生活物品、生活习惯到价值观念、思考方式。

当代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指出,文化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它使代与代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①我们生活在现实之中,但现实又是历史的延续,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同时也带来因袭的重负,不管我们是否自觉,我们终究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借助于它,历史才得以延续、进行、飞跃,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实现。因此,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必须了解传统文化。

二、中国文化概述

我们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生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1. 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我们的思索的焦点应该从我们这片土地开始。孟德斯鸠认为地理气候环境对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与精神的形成有着决定性作用;我们要说的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被自然条件所规定。

(1) 地理环境。中国东临浩瀚大海(不同于地中海、波斯湾那样的内海),西部是戈壁、高原,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黄河、长江以及支流浇灌着农田,也连接了不同区域,而大海、戈壁、高原又起到了屏障作用,也阻挡了人们对“天之外”的视线和欲望。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产生了作为中国文化的现实基础的农耕经济和宗法社会。

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长。华人先民六七千年前就进入以种植为基本方式的农耕时代。至殷商西周,农耕业已经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岭淮河以北是生产小麦、粟米的旱地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则成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钱穆先生指出,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古代文明皆产生于肥沃区域,独有中国文明是在贫瘠并比较大的区域产生,因而不断有新的刺激与发展前途,在文明生产过程中,社会内部

① 希尔斯.论传统.傅理,昌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4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9页

始终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中华文明,在四大古文明中,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阻断了异域力量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与两河领域、尼罗河领域相比,恶劣的自然条件使人们抵御外部挑战的能力和社会组织的结构更加强、更有力。黄河流域铜铁矿资源较少,金属农具在公元初的战国才广泛使用,而埃及人、苏美尔人、印度人在公元前 4000 年至前 3000 年已使用金属农具。我们知道,黄河落差很大,流经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卷走了大量泥沙,河流经常泛滥,频繁的洪涝迫使人们在治水的过程中建立大规模的社会组织。这样,从伏羲、神农到炎帝、黄帝,从禹到尧、舜,我们看到的是血缘部落的不断强化进而融合成更大的部落联盟国家。

(2) 农耕经济。古代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农业生产注重实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久而久之形成了勤劳务实的民族性格,重实际而黜玄想。中国古代贤哲一向提倡“君子务实”,朴实、勤劳、埋头苦干一直是我们民族优良的传统,人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厌恶虚夸、巧取,以至科技思想和知识被看做“奇技淫巧”而遭鄙薄。另一方面,这种偏重实惠与眼前功利的民族性格又限制了生产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急功近利,追求即时的效益,就是这种“吹糠见米”的功利意识的表现。

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农业生产与定居密切相连。适应农耕的需要,人们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安土重迁,于是就有对土地的眷恋,爱故土,重乡情。远离故土的游子,总是对故乡怀有深深的眷恋,希求“叶落归根”。这种恋土重迁的生活方式和习性,使农人习惯于附在小片土地上周而复始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追求生活的稳定和安定,无以产生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欲望。

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加上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容易使人形成泱泱大国、四海独尊、万国来朝的“天朝”、“大国”心理,乾隆皇帝复英王乔治三世信称:“天朝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其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华夏大地由 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分为褐色、绿色两大片,西北地区雨水少,人们以畜牧为生,食肉饮乳,迁徙无定,“一件皮袄,一杆猎枪,一顶帐篷走四方”。当牧区水草丰茂,游牧民族满足于自己的草原生活,通过长城口的“茶马互市”以畜产换得粮食、茶叶、布帛;而当草枯水乏时,则不得不南下劫掠。游牧民族骁勇善战,一旦建立起比较强大的统一的军事组织,短暂的劫掠便发展为大规模的战争,攻城掠地,入主中原,例如鲜卑族拓跋珪所建的北魏、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以及满人建立的清朝。

(3) 宗法社会。中国古代,人们称为“宗法社会”。“宗”,本是“祖庙、祖、族”的意思,宗法制度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并且由此区分尊卑长幼,确定继承秩序以及家族成员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与制度。黄河流域严峻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经济使古代先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众志成城,应对自

然和社会的挑战。华夏文明或许真的是“早熟”的文明,大规模的治理洪水使不同区域的人们联合起来,在铁质农具尚未推广、产品的交换和社会的分工没有普及、土地还没有完全私有化的情况下,氏族内部的血缘关系被保留了下来。“商子孙分封,以国为姓”,西周灭亡 99 国、降服 652 国,这些国是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国即家。“如果我们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是由家族到私有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①家国一体,国家的制度和运行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纽带和人伦关系之上。所以,以亲情伦理为内容的儒家思想最终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

夏、商两代仍保持氏族制的形式,各级氏族组织也是各级行政组织,首领即是行政长官,整个国家则是以有夏氏或商族为统治部族的部族大联盟。但商朝王位继承非常混乱,父死子继、兄死弟及、两兄弟的子孙轮流为王……以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者,吸取商朝未能建立确定不移的继统法以致内乱不止的历史教训,建立了立子立嫡的权力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王从王室中分出去,另立为宗。分宗一般都伴以授土授民的封邦建国,这既是让失去王位继承权的诸王子分享王室的部分权力,消除他们的不满,又可以使周王朝的大部分疆土掌握在最为可靠的兄弟、同姓手中,这就是“封建制”,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②。周初统治者通过封建把大部分土地和人民都控制在兄弟、同姓手中,也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为把他们也纳入血缘网络之中,周初统治者实行异姓通婚制度。这样,王与诸侯之间不是兄弟、叔侄,就是甥舅。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士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实行分宗和封建的结果是在周朝内部形成许多诸侯国;各诸侯国的公室也仿效这一做法进行分宗和分封,从而在各诸侯国内又形成了许多大夫之“家”;大夫之“家”虽然不再裂土分封,但还是要分宗的。这样就造成了王、诸侯、卿大夫、士之类的等级。西周灭亡后,以姬姓贵族血缘纽带攀联而成的统治体系土崩瓦解,秦汉以降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官吏选拔以“贤贤”取代“亲亲”已成主流,军功、荐举、考试直至科举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世卿世禄制,但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嫡长子继位法、父权家长制长期延续,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导致专制政体的早熟和长期延续,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

宗法制度的本质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方面具有共同性,都是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家长制,这就是所谓的“家国同构”,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因而“国”与“家”彼此沟通,“齐家”与“治国”相互为用,所谓“治国必

①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1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00. 420,以下所引该书均出此版

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教于国”^①;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宗法制度特别强调对祖先的崇拜,强调尊祖敬宗,宗族有严格的宗庙祭扫制度,历代君主十分重视宗庙的营建,并将其与社稷并重,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王宫前左宗(太庙)右社(社稷坛)的建筑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在民间则普遍建有祠堂、家庙,作为家族祭祖之地。

2. 中国的文化“轴心时代”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亦即通常所谓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从苍茫天地中走来,经过了夏、商和西周,终于出现了孔子、老子等文化巨人,作为我们民族的代表反思文明的历程,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人类生活的准则。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禹因治水而博得众多部落首领的拥护,拥有召集诸侯会盟的权利并掌握军队、刑法,在治水的过程中部落联盟发展为国家;启继禹之位,开创了家天下的历史,启也被称为中国第一帝王。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排水管道设施、车辙痕迹,在石器、骨器之外还出土了铜器、青铜器,并发掘出大型青铜冶铸作坊,这表明夏代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夏代“以铜为兵”、铸“九鼎”的传说看来并非虚妄。

公元前16世纪,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商代是神权政治的极盛时期,安阳殷墟所发现的10余万片有字甲骨多是占卜之用,青铜礼器、人殉也都表明商人对神明的敬畏。前11世纪,武王伐纣克殷,建立周朝。周人吸收殷亡国的教训,强调“敬德”,强调用人力、人的道德保“天命”,即掌握政权,并在制度上作了创新。商朝王位继承非常混乱,父死子继、兄死弟及、两兄弟的子孙轮流为王……鉴于殷商王位纷争的教训,周公谢绝了武王的建议,辅佐武王的嫡长子成王继位,西周最根本的制度——嫡长子继位的制度由此确立。这一继统法则确保了王位的平安过渡,并由此又衍生出“授土授民”、“别子为宗”的分封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宗族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制机构。周朝君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根据王国维考证,除了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还有丧服制度(用五等丧服来表示宗族内部亲疏和宗法关系)、庙数制度(各级贵族的庙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

公元前771年,镐京被犬戎攻破,周幽王被杀,翌年周平王迁都于洛邑,周天子“天下共主”权威名存实亡,列国纷争、礼崩乐坏。西周礼制的瓦解,最直接的原因是统治者所欲为,践踏了先祖所制定的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周幽王废嫡立庶,还举骊山烽火戏弄诸侯,周平王由母舅申国侯立,间接犯了弑父罪。上行下效,鲁桓公杀了哥哥夺回国君之位,鲁国国君又被大夫杀,三桓作乱,等等。由于经济的

① 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040,以下所引该书均出此版

发展,诸侯国拥有了比周王朝更强的实力,于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自诸侯出”,再变为“自大夫出”。中国进入了大分裂、大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大片新的土地被耕种,个体农民的生产活力冲破了集体耦耕的井田制,“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商业繁荣,出现金属货币和大都市、大商人,诸如临淄、邯郸和郢,诸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后来成为秦国的丞相吕不韦。随着经济的飞跃发展,新兴的政治势力崭露头角,诸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比如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晋国一分为三;姜姓齐国被田氏取代,也得到了周王的正式承认。三国分晋和后来的田氏代齐昭示着西周宗法的崩溃,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征战不已,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的255年中大小战争有230次。

春秋时出现了士这个社会阶层,士掌握专门的文化知识及技能,有文士、武士以及辩士,不耕而食、不富而贵。时人有言:“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韩诗外传·卷七》)士最初是从奴隶主贵族游离出来的,有一些是属于平民阶级,也有一些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以及获得解放的奴隶。周平王东迁时,王宫里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论语》记载了周天子宫廷中掌管礼乐的官吏纷纷出走的情况。大乐师挚到齐国、二乐师干去楚国、三乐师缭到蔡国、四乐师缺去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人居汉水附近,少师阳和击磬的襄移居于海边。^①这些官吏由于失去了世袭的职守,流落于社会之后不得不靠出卖知识糊口。士从统治阶级中分离出来,改变了“学在官府”的状况,私学兴起,苏秦这样的农家子弟可以凭借其才能和勤奋出人头地。列国诸侯为了自己的霸业,争先“招贤纳士”。春秋时的齐桓公养士80人,“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②到了战国,“养士”之风就更为盛行,诸侯国君,如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都一度为天下士众所归。尤其是齐国,国君在都城临淄西门外创建稷下学宫,将学者封为“大夫”,在高门大屋著述讲学,“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稷下学宫延续了五代君王一百多年,鼎盛时学者贤士达千人,孟子、荀子曾是“稷下先生”,周围簇拥着“稷下学士”。

春秋战国历经半个多世纪,那是个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飞跃发展的时代。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列国之间你争我夺,杀来杀去,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以立于不败之地,不得不广纳人才,不得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改革。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再到秦王一统天下,我们的祖先以血与火探索,最终构建中华大地上的社会秩序。也就在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时代,先哲们在精神世界中寻觅社会的前

① 金良年. 论语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226, 以下所引该书均出此版

②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298

途、人类的福祉。旧的生产和生活模式、政治制度以及价值体系瓦解,人们可以理性地审视天地以及天地中的人,思考人在社会及自然中的位置、意义。士,具有独立人格、意志以及价值标准,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对礼崩乐坏的现实以及西周的礼乐文明的审视、反思的历史责任。孔子认为西周的礼制是最完美的,他竭尽全力实践、宣扬,并“以仁释礼”,以其“仁学”突出了人性的尊严、人道的自觉,阐述了“人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孟子进而提出了“仁政”、“王道”的主张。墨家也讲爱,试图以人与人的相互尊重、关心来消除人世间的争斗、杀戮。不过墨家是从小生产者的利益来审视礼乐文明,他们的目光穿过了等级森严、繁文缛节的西周而投向尧舜之世。道家走得更远,仰慕人与麋鹿为伍的蒙昧时代,通过对自然的叩问阐述人的存在及其超越,否定了西周的礼乐制度。法家则是站在“国家”统治的立场思考问题,关注的是富国强兵,他们认为儒家的礼治是空洞的、虚幻的,应该用奖惩去驾驭臣民。此外还产生了关注形而下的知识和技能的仁人志士,诸如兵家(孙武)、名家(惠施、公孙龙为代表,主张辨别名实关系)、阴阳家(用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来解释朝代更替)、农家、纵横家(苏秦主张合纵,即六国联合以抗秦;张仪主张连横,使六国屈从于秦)、杂家(吕氏集宾客编成《吕氏春秋》,撮合各家观点)……总之,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如王国维所概括,“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①

3. 中国文化的历程

公元前 221 年,秦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大势所趋。孟子早就有天下终究“定于一”的观念,诸侯列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动荡也是文化的大交融,秦确立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权力集权于中央,中央政府设置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宗正、典客、少府、治粟内史、廷尉),分管各项政务。在地方“废封建,行郡县”,将全国划分为若干郡县,设置郡守和县令。秦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将六国繁杂难写的大篆文字改为均圆整齐、笔画简省的小篆和隶书;修治驰道,统一车轨;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并在日常生活方面做出规范,比如庶民以黑布裹头,称为黔首。汉承秦制,不过治国思想有了变化。建国初以“黄老思想”为治国之本,实行“无为而治”;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武帝开始有所作为,加强中央集权,征伐匈奴,以儒学收拾人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丝绸之路”开通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

西域开通,给佛教的东来创造了条件。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臣伊存首次将佛经传入中国。明帝时印度僧人竺法兰来华,明帝令其在洛阳建白马寺,翻译佛经。佛教宣扬慈悲普度、善恶报应、轮回转世,只要依法修行便能脱离苦海,为辗转于苦难

^① 王国维. 论近年之学术界. 王国维文集(第三卷).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36

现实的人们提供了终极关怀。与此同时,神仙方术之士托名黄老之学,夹杂鬼神崇拜,创立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战乱不已,儒家的“三纲五常”受到严重的挑战,出现了“非君论”(阮籍)、“无君论”(鲍敬言);名士“皆以任放为达”,高谈老庄、专谈玄理,纵情山水、放浪酒药。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寺院增多,魏明帝时洛阳城内外就有1367所,大造石窟佛像,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甘肃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都于此时开始营造。后秦僧人法显西行取经,西僧鸠摩罗什来华,相继翻译出佛经数十部。崇信佛教的梁武帝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并称为“三圣”。这一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先后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南方的越、蛮、奚、俚、僚等族也与汉族发生交往。胡人从轻汉、抑汉走向全面汉化,“入中国则中国之”,改易“胡风国俗”。

隋唐重建了统一的国家。隋文帝开始在汉长安城的东南兴修大兴城,唐朝继续兴修,改名长安,又兴修东都洛阳。大运河也全部凿通。三公九卿制发展成三省六部制。宰相为三省长官,中书省掌诏令、门下省掌谏议、尚书省掌行政。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来分管各项具体行政事务。科举考试制取代了西周的世禄世卿制、秦汉察举征辟制、魏晋九品中正制,这是官吏选拔的制度创新。中国进入了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盛唐”。人口增多、交通方便促成了经济的突飞猛进,百姓生活富庶,如杜甫所描绘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丝绸、棉布、茶、酒、糖、瓷器从专业作坊生产出来,在城市进行贸易,甚至远销海外。棉布从西域传入,蔗汁熬糖从印度传入,人们以博大的胸怀吸纳外国文化,历法、医学、建筑乃至胡乐、胡舞、胡食、胡装广泛吸收。同时,华夏文明的成就也传播海外,造纸术经大食(阿拉伯帝国)传入欧洲,改变了欧洲羊皮作纸的情况。炼丹术的西传推动了欧洲炼丹术的成长。十进记数法传入印度推动了位值数码的产生。中国瓷器通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到达波斯、叙利亚、埃及和非洲东南岸。

宋朝,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顶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世界古代史上占领先地位。陈寅恪先生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冶金、造船、纺织、印刷、制瓷、医药等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手工业、商业繁荣,成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商行组织出现,纸币在全国流通;海外贸易增加,船只远航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感慨:“直至十一、十二世纪以前,中国人并未显示商业上的才干。但打那以后,经商能力便成为中国人最卓越品质之一。”^②

13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忽必烈灭宋,1271年以大都(今北京)为都建立元朝。如马克思所言,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

①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之考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②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6